

中华民族“凝聚力”考古学研究

刘庆柱 刘秀娟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其不断裂的表现,是这一文明的祖先还是中华大地上“百万年人类史”与“一万年文化史”的缔造者。“中华文明史”的实质是中国的国家历史。以考古学、历史学、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族群,得出几乎一致的科学结论,它们有着基本共同或相近的“遗传基因”、共同的“祖源”。在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中,不论是什么时代(王朝),也不论是中华大地什么地方的族群或人群管理中华国家,都坚持“中”与“中和”的国家“大一统”理念,从“三皇五帝”到历代中华不同族群建立的不同王朝,都维系着“中华统绪”,这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华大地的多民族共同体对中华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同、对中华民族及其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回顾古代世界的两河流域文明、埃及古文明、印度古文明与中华文明“四大文明”,加之美洲的玛雅文明与印加文明,除中华文明之外,至迟在公元6世纪或“大航海时代”之后,其他文明均已“断裂”,而只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之所以这样,乃是源于中华文明一代又一代传承着从“家国一体”到“家国同构”至“国家认同”的“中”与“中和”这一“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

[关键词] 文明;不断裂;凝聚力;文化基因

[中图分类号] K0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2023)03-0058-11

DOI:10.15970/j.cnki.1005-8575.2023.03.002

一、关于“文明”的说明

“文明”一词亦见于中国古代文献中,如《尚书·舜典》记载:“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睿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周易·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注疏:“文明”是“有文章而光明也。”《周易·同人》:“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周易·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1]冯时认为:中国传统文明体现的是中国古代的“道德体系、知识体系和礼仪制度基础上的文明社会”^[2]。

19世纪德国学者曾提出“文明”是“物质成就”的体现,“文化”是“精神成就”的体现。这与西方及近现代以来国际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术界使用的“文明”之意义不

同。社会上流行的“文明”一词,如《辞海》的“文明”定义:“同文化”;又称“文明”为“社会发展水平较高有文化的状态”。有的把“文明”分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文明史”是有“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反之则为“人类的史前史”^{[3]19}。中央关于“文明”的最新解读是2020年9月28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的:“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4]笔者认为这里所说的“人类史”“文化史”及“文明史”即考古学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及“历史时代”,历史学的“原始社会史”(即习近平讲话中的“人类史”“文化史”组成的“史前史”)与“国

[收稿日期] 2023-03-01

[作者简介] 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
刘秀娟,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家历史”(即“文明史”),人类学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

作为“国家”意义的“文明”一词最早源于西方。18世纪德国人类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德尔(Johann Gottfried Herder)提出人类的原始社会、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三个阶段。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古代社会》认为人类社会分为“蒙昧”“野蛮”与“文明”三个阶段^[5]。恩格斯则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6]¹⁹³

易建平从“文明”的词源学角度,认为:“‘Civilization’(文明)与‘State’(国家)本是一家,最初的意思就是‘城、城堡’。……从词源学上追溯,不管是‘Civilization’(文明),还是‘State’(国家),都与‘Civilization’(文明)后来衍生意义上的‘文化’,包括所谓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没有什么关系。”^[7]易建平进一步指出:“现在有些考古学家将‘文明’区分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我曾经从词源学角度考察了这两个词在古希腊文、古拉丁文、中世纪拉丁文、法文和英文等文章中的演变,从词源学角度看,上述分法并无根据。”^[7]可见易建平对西方“文明”的解读与18世纪以来欧洲人类学家在探索人类社会状态时,使用的“文明”一词是一致的。因此易建平指出:“研究‘文明’起源,也就是研究‘国家起源’,所谓的‘文明’社会,也就是‘国家’社会。”^[8]笔者认为这是关于“文明”学术定义最清楚、最简洁的表述。

作为中国当代学术术语的“文明”一词,是由西方的“Civilization”于19世纪60年代传入中国的,直至戊戌变法以前,一般译为“教化”,而将其译为西方“文明”内涵(即“国家”意义)是20世纪以来的事情^[9]。

作为考古学的“文明”研究,其研究对象的物化载体应该明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6]¹⁹³,而“国家”主要包括“国民”“国土”与“国家政府机构”^①。其中“国土”即国

家“土地”与“河山”“海洋”(现代还有“领空”),这在中国考古发现中均得到佐证。如秦始皇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与“化身”,其陵墓就是“国家”的缩影,陵墓中的内容就明显表示出国家的“核心”内容。《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陵地宫之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考古工作者在西汉时期的一些高等级墓葬的墓室顶部,发现了天文星象图,司马迁关于秦始皇陵地宫中的“上具天文”应该是可信的。至于秦始皇陵的“下具地理”的“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已被考古证实,考古工作者与科技工作者合作发现在秦始皇陵地宫之上测到“汞”的分布及其不同区域的不同浓度^[10]¹²²、^[11]。古代都城是国家的“缩影”,汉武帝在都城建章宫仿照“大海”修建“太液池”,太液池中有海上“神山”与石刻“鲸鱼”^②。自汉长安城至明清北京城,历代王朝的都城基本沿袭此制,如唐长安城太极宫中有“四海池”(东海、西海、南海、北海),大明宫中有太液池。建都北京的金中都与“元大都”之内均有“太液池”,明清北京城中则以“海”(如“北海”“中南海”“西海”等)名“池”(太液池)。这体现出中国古代王朝以“海洋”作为国家“领海”的理念。

在上述“国家”内涵之中最为重要的是“国民”关于“国家认同”的理论,这是“中华文明不断裂”的根本所在。

二、“中华文明不断裂”的考古学研究

前面已经就“文明”进行了讨论,而“中华文明”研究则有必要首先研究“中”“华”与“中华”的历史,方可继而探讨“中华文明不断裂”的原因。

(一)“中”的解读

冯时认为“中”之初文为“丨”,就是测中的“表”,“古人通过立表测影的执中活动造就了汉字的‘中’”。在商周的甲骨文与金文的“中”字上部所饰之旒(“飘带”)则或为旗

① 20世纪初,法国、德国学者 Jeilnek Laband、Carrede Malberg 创立“国家三要素”说。

② 《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载:建章宫“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刘庆柱《三秦记辑注·关中记辑注》之《关中记辑注》注10:“考古工作者曾在太液池遗址东边发现一件汉代石刻鲸鱼,鱼身长4.6米,径1米。此即本文所载的‘石鱼’。太液池为汉武帝时所修的人工湖,位于建章宫北部,面积2万平方米,为一平面曲尺形。池内渐台遗址东西60米、南北40米,高约8米。”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59页。

旂。而建旗必于中央，因此“中”具有“中央”“中正”之意^[12]127、161-162。

中国古人对“中”的信仰及追求，可以追溯至久远的新石器时代晚期^[13]。1987年在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发现了一座距今6400年的墓葬，墓主人左右两侧分别放置了蚌壳堆塑的“龙”与“虎”形，足下有一象征“北斗”的蚌壳堆塑的三角形图案，在图案的东部与东西向有两根人的胫骨相连（即“周脾”）^[14]。有学者指出，此即古人测量“求中”方位的“槲表”或“圭表”^[15]。

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距今4300—1900年左右）发现的M2200与ⅡM22中^[16]，均发现与“测中”相关的“槲表”遗物^[17]54。当下，学界多倾向于襄汾陶寺城址为古代都城遗址，或许是史料记载的“尧都平阳”^[18]317-322。因而，陶寺遗址出土的“槲表”等文物，可能与“求中”的“建都”活动紧密关联。“槲表”的考古出土，表明中华文明“中”的理念形成于夏商周三代前。

目前，战国的《清华简·保训篇》是最早记载“求中”的出土文献，简文记载“五帝时代”的虞舜“求中”于“鬲茅”^[19]143、145，“鬲茅”，即今河南省濮阳和山东省菏泽一带。该出土文献又记载夏禹将其都城定于“河”（即洛河与黄河汇流之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在河南郑州、洛阳一带考古发现了夏代都城遗址：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与偃师二里头城址^[20]。这些考古发现佐证了《清华简·保训篇》关于甲微为大禹都城选址于“大嵩山”（“求中”）的记载是准确的。

根据《清华简·尹诰篇》记载：商汤“乃致众于亳中邑”^[19]133-134。《诗·商颂·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极。”郑玄《笺》：“极，中也。商邑之礼俗翼翼……乃四方之中也。”林义光《通解》：“商邑，亳也，居九州之正中，故曰四方之极。”上述文献记载也被20世纪50至80年代考古发现的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等商早期都城所证实。

周武王灭商后，新王朝的都城位于“大嵩山”核心地区。《逸周书·作雒》：“乃作邑成周

于土中。”“土中”即“中土，洛邑居天下之中”。1963年在陕西省宝鸡发现的青铜器“何尊”，其铭文“宅兹中或（国）”，“国”即都城，因位于国家空间之“中”而名之^[21]。

自夏商周至宋，大一统王朝都城的选址基本在“大中原”的长安、洛阳及开封东西一线的黄河流域，这里是古人所说的“择中建都”（亦称“择中建都”）之地^[13]。金朝推翻北宋王朝后，在北宋都城故地开封营建金王朝都城，后因考虑与金人故土距离遥远，又改变想法，将都城建于距其“起家”之地黑龙江较近，又能通过大运河南下管控中原的燕京。都城选址是“国家大事”，为了体现弃开封而建都燕京的意义，海陵王提出“燕京乃天地之中”的“理由”，定都于燕京是“以应天地之中”的“择中建都”的中华传统政治文化^①。这也促成元朝与明、清两朝定都北京^[13]。金朝称燕京为“中都”，此名又为其后元朝开启者忽必烈所延续，至元四年（1267）他“命秉忠（刘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至元八年改国号“大元”，“中都”才更名为“大都”^[22]。

（二）“华”的解读

关于“华”的源头，可以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遗址的考古发现中找到。庙底沟遗址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区西南，为原始氏族公社的村落遗址，距今5000多年^[23]。

彩陶是仰韶文化的重要特点，学术界现在一般将仰韶文化彩陶分为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秦王寨类型、马家窑类型等，不同类型的彩陶典型纹饰特点各有不同，而庙底沟类型以其“花卉纹”尤为突出。苏秉琦先生认为：“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人们的遗存，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花卉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24]

关于“华”字，金文中已见，如《命簋》《毛公鼎》的铭文中均有“华”。《后汉书·崔閼列传》：“春发其华，秋收其实，有始有极，爰登其质。”这里“华”即“花”。“花”字是北魏时期逐渐从“华”字分化出来的。在庙底沟文化分布核心地区保留至现代的一些地名、

^① 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引《元一统志》记载：“天德三年，海陵王意欲徙都于燕。上书者咸言上京临潢府辟在一隅，官艰于转漕，民难于赴愬，不如都燕，以应天下之中。”

山名、人名或部族之名，大多与“華”字有关，如：黄河流域中游的考古调查发现今“华胥”“华县”“华阴”“华山”“华州”等地附近，恰恰是庙底沟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或其附近。这里的先民应该就是崇拜“華”（即“花”）的古人。蕴含着庙底沟文化精神的高度统一的彩陶多出土于墓葬，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庙底沟文化的彩陶有“礼器”功能。因此有专家说，庙底沟文化是开启“史前中国”的密码，是中华文明探源的起点。夏商周王朝上承公元前2600年—前2000年的中原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又源于庙底沟二期文化与庙底沟文化，他们成为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的源头主干。

20世纪50年代以来，通过考古发掘及研究，发现庙底沟文化分布范围西迄甘青地区，东至鲁西与豫东北，北抵长城地带，南达长江以北，而且其地理位置又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中心地区”，其影响也最深远。

（三）“中华”的解读

庙底沟类型的“空间属性”之“中”，与其考古学“文化属性”的彩陶花卉纹之“华”，合为“中华”一词，融活动空间与文化内涵为一体^[25]，从“一万年文化史”进入“五千年文明史”时代，“华”的“文化属性”不变，“中”的“空间属性”已延展出“政治属性”，这也就使我们的先民变成“国民”，作为国家政治标识的都城之宫门、城门就以“中华”命名，而“中华”随着历史发展成为“国家”或国家都城所在地的“称谓”，如：《晋书·殷仲堪传》载殷仲堪上奏云：“盖定鼎中华，虑在后伏，所以分斗绝之势，开荷戟之路。”《魏书·礼志》：“下迄魏晋，赵、秦、二燕，虽地据中华，德祚微浅。”

“中”与“华”尽管有着久远历史，但合为一词在文献记载中出现较晚。《晋书·天文志》载《天文经星·中宫》：“东番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东太阳门也；第二星曰次将，其北，中华东门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将，其北，西太阳门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华西门也……”

与天宫的中华东门、中华西门相对应^[26]，南北朝时期的中华多用为宫门名称，如十六国后赵邺都的西中华门、北魏洛阳城的中华门及梁朝

建康城（今江苏省南京）的东中华门、西中华门。可见，“中华”这一名称在当时极受青睐^[26]。其中，尤以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平城（在今山西省大同）为著，自北向南，由宫城、外城、郭城组成。宫城是皇帝居住之所，宫城北门为中华门，它又是都城中轴线北端起点之门，由此可见平城“中华门”之重要，它是目前所知北魏平城城门中最早以“中华”命名的城门。中华东门与中华西门分别演变为明清两朝宫城的东华门、西华门，它们对称分列大朝正殿太和殿东西两侧。

随着中华文明历史的发展及国家的壮大，疆土渐广，中华成为国家称谓。特别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当时的学者王元亮就认为“中华”就是“中国”。

（四）“中华文明不断裂”的解读

“文明不断裂”，是相对“文明”的“断裂”而言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9月28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讲道：“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4]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学术界关于古代世界文明独立发展有“六大文明”与“三大文明”之说，前者即西亚两河流域古文明、北非埃及尼罗河流域古文明、南亚次大陆印度古文明、东亚中华文明与中南美洲的玛雅文明与印加文明^[27]。后一说法指近东（两河流域文明与埃及文明）、中国（中华文明）和中南美（玛雅文明与印加文明）三大文明^[28]。

号称现代西方文明源头的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前者产生于两河流域文明与埃及文明，并非“原生文明”。古希腊帝国在亚历山大之后被罗马征服，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与哥特人灭亡，西罗马灭亡也就宣示了西方“古典时代”结束，而世界文明史亦“罗马之后再无罗马”。波斯文明在西亚两河流域文明与印度文明共同影响之下产生，并先后成为地跨亚洲、欧洲与非洲的波斯帝国与“萨珊波斯”帝国（第二波斯），但是公元651年也被阿拉伯帝国伊斯兰文明所取代，波斯文明走向衰亡。北部古印度文明（巴基斯坦）因雅利安人的入侵而消失，其后又为伊斯兰文明所取代。至于恒河流域古印度文明，也是在笈多王朝之后被阿拉伯、突厥不

断征服，印度的著名世界文化遗产泰姬陵就是伊斯兰文明在印度的历史见证。

至于南美洲的玛雅文明与印加文明，随着15世纪末—16世纪初“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亦逐渐被毁灭。

中国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揭示，距今约5300年的郑州巩义“双槐树城址”^[29]与“西山城址”^[30]、世纪之交考古发现的距今4300多年的山西襄汾陶寺城址^[31]³⁵⁻³⁷、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的距今约4000年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32]、河南新密新砦城址^[33]、偃师二里头城址^[20]，均被“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早、中、晚期都城遗址^[34]⁸⁶。其后的郑州商城^[35]、偃师商城与殷墟的考古发现、周秦汉唐与宋辽金元明清王朝都城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都揭示了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一脉相承^[36]。都城作为国家（王朝）的象征，它们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华文明是古代世界唯一保留至今的“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的实证。

三、中华民族凝聚力与“中华文明不断裂”考古学研究

“中华文明不断裂”的根本历史原因是缔造“中华文明”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本文通过考古学探索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物化载体”，进而回答“中华文明五千多年不断裂”何以可能这一“世界之问”^①。

（一）“中华民族”解读

“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缔造的。如果说“中华”早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文献记载中已经出现，那么“中华民族”一词的出现要晚至近代。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曾提及：“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37]²³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清末的一些有识之士，如清朝贵族子弟托忒克·端方、爱新觉罗·戴泽在《条陈化除满汉畛域办法八条折》中提出：“满汉之界宜归大同”，“放弃满洲根本，化除满汉畛域，诸侯相忘，混成一体”。^[38]此后一批清朝满族留日学生

在日本创建《大同报》发表文章提出：“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1912年巴达尔胡在北京创办的《蒙文大同报》上明确提出“五族共和”。可以说“中华民族”就是“国族”。

虽然“中华民族”一词出现很晚，但是“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可以追溯至秦汉时代。范文澜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提出：“嬴政建立起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以汉族为基干的民族国家，这又是一个极大重要性的历史事件，可以说是伟大中国和伟大中华民族形成的开始。”^[39]秦始皇建立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这种“大一统”的国家根本制度，可以说一直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延续着。因此说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从“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发展而来的。

（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考古学解读

对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不断裂”之原因的研究，首先应该开展的是对创造这一文明的“人群”——“华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中华民族先民之研究。因为“他们”是这一不断裂文明的创造者。关于中华大地五千多年来（甚至是更为遥远的时代以来）的历史，通过考古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及体质人类学）、历史学等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首先是中华大地百年来有关“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与“五千年文明史”考古发现的与中华先民自身直接相关的遗存，这些科学资料成为我们了解古人的“密码”，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先民的“基因”（DNA）。考古工作者与分子生物学家合作探索，提出五千多年来，其人群基因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中游。换言之，生活在该地域的古人，也正是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的缔造者^[40]¹²⁰。因此说中国古史传说中国人为“炎黄子孙”是有一定道理的，与历史文献记载的炎黄部族生于此、活动于此是一致的。这也使我们认识到东亚地区古代先民的遗传基因是持续不断的，当前绝大多数国人的基因和五六千年前黄河流域中游地区的人群基因相近^[41]。

至于北方鲜卑人的族源，多年来辽宁、内蒙古、河南、北京等地区的田野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学、体质人类学、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跨学

^① 中国好书2020年4月榜单（10部，《不断裂文明史》为第一部）（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从世界史的范围来看，中华民族是唯一一个有着不曾断裂的文明史的民族。文明不断裂的原因何在？这是一个世界之问。”

科结合研究,确认鲜卑、契丹、蒙古在考古学文化、体质人类学及分子生物学三方面的一致性。遗传学方面的数据更能表明他们均源于两千年前后的汉代鲜卑人。至于史前时代西南地区与黄河流域先民的关系,近年来考古学、语言学与遗传学等学科的研究揭示:早在距今约六千年前,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先民已在黄河流域中上游的甘青地区生活,而在黄河中游则生活着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族的华夏先民。

(三) 中华姓氏发展历史

宗法社会是中国古代历史的突出特点,姓氏是宗法社会的人群基本符号,因此姓氏研究是宗法社会研究的基础,也是研究中华民族及其国家社会历史的重要学术领域。

中国学者袁义达等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姓氏的国家,“姓”大概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42]1}。欧洲大陆普遍使用姓的历史只有400年。日本直至明治维新时期,国家进行户籍登记才规定每个人必须有“姓”^{[42]1}。

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是“姓氏”研究的重要的、基础性科学方法。多年来我们的田野考古实践也证实,关注古代人类生存、生活、生产的“平台”——房屋、聚落、聚落群等古代遗存,是揭示古代“人”“人群”彼此血缘与地缘关系的一把科学钥匙。从旧石器时代北京周口店猿人的“群居”,到新石器时代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43][44]}、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45]、陕西西安半坡遗址^[46]和临潼姜寨遗址^[47]及高陵杨官寨遗址^{[48],[49]}、河南灵宝西坡遗址^[50]、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51],[52]}、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53]等聚落遗址的发现,其房屋布局结构为探索当时人们之间的“婚姻”“家庭”关系,提供了实物资料。

古代墓葬考古资料是考古学进行“姓氏”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古代墓葬中的死者性别、年龄、墓内彼此分布位置、随葬品等,是研究同一墓葬中的不同人之间关系的重要考古资料。同一墓地不同墓葬的分布位置,又可揭示彼此关系。

现代分子生物学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极大地促进了考古学的“姓氏”研究:其一,对现代中华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姓氏”的人,通过DNA技术与碳十三食性分析方法,寻找到古代

“姓氏”的分布地域及其“姓氏”移动信息。其二,通过古代墓地的大规模考古发掘,从古人的骨骼提取DNA样本,建立其遗传学关系,探讨“人群”变化,探索“人群”迁移时空,从而为“姓氏”研究提供基础科学资料。就目前中国考古学发展来说,上述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已经起步。可以肯定地说,新的科学技术方法、手段的应用,必将推进“姓氏”研究的发展。

鉴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成果,学术界已经基本认为“姓”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而史前时代的仰韶文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发达、影响最大的母系氏族考古学文化^{[54]143,[55]}。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区在河南西部、陕西南部、山西南部,其中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最为重要。“庙底沟类型主要分布于华山以东、崤山以西的豫西三门峡地区和汾河中下游的晋南地区”,其“强大时西逼甘东,东据郑、洛,南抵宛襄,北达河套。它的影响面更大,西至甘青,东抵沿海,南到长江南北,北达长城内外,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56]49}。这与我们现在了解的中国人姓氏分布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最新发表的相关资料显示,“在现代中国依据人口数量多少而排列的300个大姓中,有170个姓氏的源头或部分源头在河南,在最新排列的100个大姓中,78%的姓氏源头或部分源头在河南”^[57]。这是五千多年来历史发展的必然。先秦时代,在“大中原”地域之中属于不同“姓”的家族、宗族之间,形成长期的婚姻关系,构成最初的“华夏族”。秦汉时代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就是在“华夏族”的基础之上,在东亚更大区域中(基本与现代中国地域相近的空间范围),共同形成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姓氏学研究有助于清晰彼此的血缘关系,进而探索社会上“人群”“族群”与“国民”的彼此关系^[41],这是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研究领域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以考古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古代姓氏文化,可以为世界姓氏学研究作出重要科学贡献!

(四) “炎黄同源”的解读

中国人都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黄帝”既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又是中国人的

“第一国父”^[58]。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有着中原与“四夷”之说，所谓“四夷”就是中华大地东西南北四方周边的少数民族群，即历史文献记载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四夷”。而“四夷”族群的首领又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如历史文献记载的“东夷”为“黄帝之子”少昊之后裔，被视为“西戎”后人的苻洪（前秦皇帝）自称其祖先为“有扈之苗裔”，而“有扈”为大禹之后。被视为“南蛮”的楚人，《史记·楚世家》记载其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则记载“百越”先祖属于“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北方地区匈奴也认为：“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北魏时期，来自大兴安岭的鲜卑人也自称：“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之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

（五）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国家认同”

关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国家认同”，可以从“帝王庙”设置、发展及“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的“文化基因”两个方面进行考古学、历史学解读。

1. 帝王庙（国家的“宗庙”）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完整历史的缩影

在中古时代以后的中国古代都城出现的帝王庙，与传统的都城礼制建筑中的“宗庙”“社稷”“明堂”“辟雍”“灵台”等不同，也与各种类型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等祭祀天地日月及其他祭祀性建筑不同。帝王庙是祭祀传说时代“帝王”与“前朝”帝王及有“文治武功”名臣的建筑，也可以说“帝王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历史博物馆”。

对于传说时代“帝王”的祭祀，历史文献记载先秦时代已经开始。祭祀的“帝王”实际上是传说时代（一般认为属于史前时代）的“圣君”，如黄帝。对其祭祀不在祭祀对象“传说”的当年都城或其故居之地，如《史记·秦本纪》《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等历史文献记载秦灵公就在当时秦国都城雍城（今凤

翔）附近祭祀黄帝、炎帝^①。这些记载又被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在陕西省凤翔县西北柳林镇的血池村东南距秦雍城遗址15公里处，雍山考古发现了一处总面积470万平方米的秦汉时代祭祀遗址，已发现3200个祭祀坑，根据已发掘面积，推测该处至少应有祭祀坑约5000个。祭祀坑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在坑里发现了大量的马骨、木车、金属残片和玉器。在祭祀坑大约直线两公里之外的山梁上发现了夯土平台遗址，上下三层。发掘者根据上述对比，推断这个夯土遗址就是祭坛^[59]，类似在唐长安城明德门之外考古发现的唐代“圜丘”遗址（即“天坛”），为上下三层^[60]。参照《史记》《汉书》等历史文献相关记载，该遗址可能与祭祀黄帝有关。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为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成员国，作为起家于西戎之地的秦国，秦人力图证明其“诸夏”之“身份”，因此祭祀黄帝应该是出于政治需要。但是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对“黄帝”的祭祀活动是可信的，先秦与秦汉时代传统历史文献对黄帝的祭祀也有不少记载^②。

南北朝时期不少北部、西部的族群进入内地，并且建立了不少“王朝”，如鲜卑人创建的北魏王朝，其皇帝不但对黄帝、帝尧、帝舜等进行祭祀^{[61]、[62]}，而且还有周王朝的政治人物，祭祀活动在传说圣君活动的地方举行，体现出北魏对“华夏”历史与文化的认同。

隋代帝王祭祀的进一步发展，反映在从夏商周到汉代的“开国”帝王均在祭祀之列，此外还有更多名臣。这时的祭祀活动，在被祭祀对象的都城故地或其陵墓附近。

唐代初年延续了隋代祭祀传说圣君与夏商周及汉代开国帝王作法，祭祀地点也没有变化^[63]。唐玄宗时期，帝王祭祀发生了重大变化，都城内存建了祭祀“上古之君”和“三皇五帝”的“帝王庙”^{[64]369-371}。但是，这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帝王庙”，而是对共同“祖先”的祭祀。

降及宋代，对先代圣君、历代帝王的祭祀主要在他们各自的陵墓前进行^[65]。

① 《汉书》卷二十五（上）《郊祀志》（上）载：“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畴，祭黄帝；作下畴，祭炎帝。”

② 《竹书纪年》记载：黄帝之大臣左彻“削木为黄帝之像，帅诸侯朝奉之。”《国语·鲁语（上）》记载：“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升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丰隆之葬，以诏后世。”《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记载：“其来年冬，上议曰：‘古者先振兵泽旅，然后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

关于元代的祭祀对象主要为先代圣君及少数帝王等,祭祀地点多在被祭祀者生前重要活动地区^[66]。

明代,朱元璋在南京城中修建了历代帝王庙,祭祀18位明以前王朝的开国君主,元朝皇帝也享祀于帝王庙^[41]。这也寓意着明王朝将元王朝视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因此,明代将原有的“帝王庙”更名为“历代帝王庙”。“历代”十分重要,意味着是冲破了“朝代”限制的“国家历史”。更重要的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又将先前朝代中37位汉族或少数民族的“名臣”,从祠于历代帝王庙^①。

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在北京“建历代帝王庙于都城西”。清历代帝王庙又承袭明历代帝王庙,其最大特点是,不仅明代的国君与功臣,辽、金、元三代帝王及其名臣也被列为祭祀对象。清历代帝王庙的祭祀对象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所有的王朝及帝王,祭祀的内容也更为“全面”“系统”“完整”,历代帝王庙成为真正意义上“国家”的“庙”,而非某个王朝、某个“圣君”的“庙”。“帝王庙”宏观地展示出“中华统绪”,“叙述”着“国家”的历史,而不是王朝“明君”的汇聚地。历代帝王庙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完整历史缩影。

清历代帝王庙的又一重要历史意义是,女真人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他们认同中华民族数千年形成、发展的文明史。不论哪个王朝,也不论是哪个民族作为国家统治者,历代帝王庙凸显的都是将其视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历代帝王庙祭祀也表明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不断裂”。

上述历代王朝对黄帝的祭祀,都城中“帝王庙”的营建以及祭祀活动的不间断举行,这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正是基于历史上多民族对共同国家——中国的认同,对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认同,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41]。

2. 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的“中”与“中和”是历史“文化基因”

历史“文化基因”是从遗传学的术语“基

因”借用而来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基因”定义:“世代相传的遗传信息的载体。”^[67]⁴⁸考古学视阈之下的中华文明“基因”研究,主要是以国家形成的“要素”为切入点,国家的核心“要素”是管理国家的平台——都城选址所反映的国家政治文化的“中”与“中和”理念。

古代都城选址是国家大事,必须遵循中华历史文化的“中”之原则,也就是“择中建都”(即《吕氏春秋》记载的“择中建国”)。如前所述,从“五帝时代”至清的国家都城,均遵循“择中建都”惯例^[68]。“中”是相对应于“东西南北”之“四方”而言的,因为“中”在“东西南北”“四方”之“中央”,形成二者关系的“中”与“和”的“中和”。“四方”必须和于“中央”,这就是“中和”,“中和”确保“中”的至高无上。从宏观上来说,代表国家的都城选址于国家空间之中央,其对东西南北“四方”而言是“等距离”的,是“国家”通过“等距离”对“四方”表现出“公平”“公正”“公允”,这是“四方”凝聚于“中”的保障^[69]。

都城“中”与“中和”的观念在考古发现中也得到实证。如鲜卑人在建立北魏王朝后,再次徙都至“天地之中”的洛阳^[70]。“大金”王朝徙都燕京,命名都城为“中都”,这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使“择中建都”与都城之名相统一,“中和”理念达到更高层次。它们反映了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对“中华文明”之延续与深化发展,是对“中华”国家文化的认同。这与百年中国考古所揭示的“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的历史发展完全一致。

“中国”的国家名称,源于“中和”之“中”。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铭文“宅兹中或”的“中或”,即“中国”。所谓“中国”,如《史记·五帝本纪》中《集解》:“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中国古代都城形制蕴含的“中”与“中和”的理念,被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认同。北魏洛

① 《明史》卷五十《礼志》(四)之“历代帝王陵庙”。

阳城、金中都及元大都等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也继承了“中”与“中和”理念，强化了国家认同的思想^[62]。“中”“中和”理念之所以有此长盛不衰的生命力，原因在于它已渗入中华民族的“血液”里，这是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华民族从“家国同构”到“家国一体”的理念，国民将“国”视同“家”，作为国家“大事”的择址建都要遵守“中”与“中和”原则；而作为国民的“家”，居室的“四合院”布局、家宴与“全家福”合影均要体现“家长”（或辈分高者）“居中”与其两侧形成“中和”的空间布局^[71]。这也就是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与共同价值观。

结语

在世界文明史上，唯有中华文明有着五千多年不断裂的文明史，“五千多年文明”何以不断裂，已成“世界之问”。本文对此进行回答：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不断裂的根本原因是：作为缔造其“文明”（即“国家”）的“国民”对其“国家认同”，而其“国家认同”的基础是其国民认为“家国同构”与“家国一体”，这一思想、理念就是“中”与“和”形成的有机整体“中和”。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数千年来形成并延续的“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它确保了“中华文明”世代代延续不绝。

[参考文献]

- [1] 十三经注疏：春秋正义：卷五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 冯时.文明论[C]//韩国河.根与魂：考古学视野下不断裂中华文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
- [3]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4] 习近平.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J].求是，2020(23)：4-9.
- [5] 摩尔根.古代社会[M].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 易建平.从词源角度看“文明”与“国家”[J].历史研究，2010(6)：27-35,190.
- [8] 易建平.关于国家定义的重新认识[J].历史研究，2014(2)：143-161,192.
- [9] 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J].近代史研究，2006(6)：1-34.
- [10] 刘庆柱.秦始皇陵考古述评[C]//探古求原：考古杂志社成立十周年纪念学术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 [11] 张卫星.地下秦朝[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22.
- [12] 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 [13] 刘庆柱.韩国河.历史考古的考古学文化阐释[J].中国社会科学，2021(9)：159-171.
- [1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濮阳西水坡[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 [15] 冯时.《保训》故事与地中之变迁[J].考古学报，2015(2)：129-156.
-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J].考古，2003(9)：771-774.
- [17] 冯时.陶寺圭表及相关问题研究[C]//考古学集刊：第19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 [18] 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M].增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 [19] 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下册[M].北京：中西书局，2010.
- [20]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M].简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
- [21] 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J].文物，1976(1)：64-65,93.
- [22] 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17.[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588.
- [2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 [24]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 [25] 刘庆柱.陕州文化：序[J].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16(2)：1-2.
- [26] 胡阿祥.中华：“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J].唯实，2016(7)：79-83.
- [27] DANIEL G.The first civilizations[M].Sterling Pub Co Ine,2004.
- [28] 富兰克福特.近东文明的起源[M].子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29] “河洛古国”神秘面纱揭开：郑州巩义双槐树遗址被誉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N].河南日报，2020-05-07.

- [30] 张玉石,赵新平,乔梁.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J].文物,1999(7):4-15.
-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国家文物局.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 [32]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
- [33]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 [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 [3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 [36] 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 [37]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38] 端方,戴泽.条陈化除满汉畛域办法八条折[Z]//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915.
- [39] 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J].学习,1950,3(1):45.
- [40] 李辉,金力.Y染色体与东亚族群演化[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 [41] 刘庆柱.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特点的考古学阐释[J].中国社会科学,2019(12):4-27,199.
- [42] 袁义达,张诚.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43] 杨虎,朱延平,孔昭宸,等.内蒙古教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85(10):865-874,961-962.
-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教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J].考古,1997(1):1-26,52,97-101.
- [45]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 [4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 [47] 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48] 王炜林,张鹏程,袁明,等.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1(6):16-32.
- [49]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高陵区文体广电旅游局.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8(4):3-17.
- [5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西坡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 [5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皖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的发掘与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 [5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蒙城县文化局.蒙城尉迟寺:第二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 [5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枣阳雕龙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 [5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黄河水库考古报告之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 [55] 杨育彬,袁广阔.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 [5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考古四十年:1952-1992[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 [57] 徐光春.序言[M].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华姓氏河南寻根:第一卷.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
- [58] 刘庆柱.国祭也是祭国[N].光明日报,2015-09-07(16).
- [59]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等.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考古调查与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0(6):3-24,134,25-49,2,129.
- [60] 安家瑶,李春林.陕西西安唐长安城圆丘遗址的发掘[J].考古,2000(7):29-47,114-116.
- [61] 魏书:卷二:太祖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62] 郑樵.通志:卷四十三:礼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 [63] 旧唐书:卷二十四:礼仪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64] 王溥.唐会要校证:卷22:前代帝王[M].牛继清,校证.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
- [65] 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五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66] 元史:卷七十六:祭祀志:古帝王庙[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67] 不列颠百科全书[M].国际中文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
- [68] 刘庆柱.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和魂[J].中国民族博览,2021(9):19-23.
- [69] 刘庆柱.“中和”基因维系中华文明绵延不绝[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9-30(2).

[70] 刘庆柱.我国古代都城遗址的“中和”理念[N].光明日报,2019-08-20(10).

[71] 家国一体与国家认同[N].天津日报,2020-11-16(11).

Archaeology of the “Cohe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LIU Qing-zhu, LIU Xiu-juan

(School of Histor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pointed out that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the only civilization in the world that has continued from ancient times and has never been interrupted.” The uninterrupted civilization has been manifested by the fact that the ancestors of this civilization are also the creators of the “millions of years of human history” and “10,000 years of cultural history” over the land of China. The essenc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the national history of China. Study of ethnic group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rchaeology, histo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can make almost identical scientific conclusion, i.e. they have basically common or similar “genetic genes” and common “ancestral origi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for over 5,000 years, no matter what era (dynasty), no matter what ethnic groups or people managing the Chinese country, they adhere to the national “overall unity” concept of “Zhong” (Central) and “Zhonghe” (Central Harmony). From the “Three Sovereigns and Five Emperors” to the different dynasties established by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China, the “Chinese unity” has been maintained,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multi-ethnic community of China formed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recognition of the excellent Chines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ts greatness. Looking back at the “four 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world, namely, the two river basin civilizations, the ancient Egyptian civilization, the ancient Indian civilization and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plus the Mayan civilization and the Inca civilization in the Americas, except for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other four civilizations have been “disrupted” no later than the 6th century AD or the “Age of the Great Voyage”. This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inherited for generations the “Zhong” and “Zhonghe” from “national integration” to “national identity” unconsciously as its cultural gene.

[**Key words**] civilization; uninterrupted; cohesion, cultural genes

[责任编辑 李 劼]